

转型背景下的收入差距与社会信任

丁从明^{1,2} 张 亮¹ 王 聪¹

(1.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重庆大学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重庆 400044)

[摘 要] 基于 CFPS(2014)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了收入差距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地降低了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基尼系数每增加 1 单位,平均而言社会信任水平下降 27.4%;另一方面,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水平的不利影响是“关系依存”的。关系网络越是紧密的群体,收入差距对其信任水平的不利影响越小;关系网络越是松散的群体,收入差距对其信任水平的破坏效应越大。相对于农村而言,城镇收入差距扩大对社会信任水平的不利影响相对更大。为提高转型期社会信任水平,不仅要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降低收入差距,更要重视“关系网络”的软环境建设,实现社会资本的可持续积累。

[关键词] 收入差距;关系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资本

[DOI 编码] 10.13962/j.cnki.37-1486/f.2020.02.002

[中图分类号]F0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410(2020)02-0015-11

一、引言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质量大幅提高。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分配问题日趋严重。1981 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仅为 0.288,到 2017 年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 0.467^①。收入差距不仅导致居民健康水平下降、受教育年限缩短,而且严重阻碍社会流动、抑制经济增长。^{[1]-[3]}伴随收入差距扩大的是社会信任水平的普遍下降。人际和群体之间的不信任逐步加深和固化,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仅 2 到 3 成信任陌生人^②。在此背景下,本文研究收入差距和社会信任的关系:收入差距扩大是否降低了社会信任水平?不同关系强度下,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的不利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这一差异的模式是什么?

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会降低居民社会信任水平。一方面,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居民社会地位分化严重,社会地位较高和较低居民信任水平低于中间阶层,伴随社会中间阶层在社会分化

[基金项目] 北京大学管理科学数据中心课题“社会信任模式的区域差异及其经济影响研究”

[作者简介] 丁从明(1979-),男,江苏淮安人,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经济学,制度与经济转型。

①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中国居民收支与生活质量报告(201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334.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总体信任度下降,社会冲突增加[EB/OL].<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3/0107/c1008-20118381.html>.

过程中占比不断下降,导致居民平均社会信任水平的下降;^[4]另一方面,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居民主观性态度发生变化,由于普遍存在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心理,人们认为收入分配有失公允,时常感受到压力与无助,使得他们表现出较低的社会信任。^[5]

中国社会正逐步从传统的、基于身份的关系型社会向现代的、非人格化的契约社会转型。建立在亲属、熟人或邻里之间的关系网络能够抵御外部的不利冲击,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城镇化的推进,上述关系网络的瓦解将传统社会逐步推向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传统关系网络的瓦解将进一步放大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的不利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本文研究发现:(1)收入差距扩大降低了社会信任水平,基尼系数增加1个单位,平均而言社会信任水平下降27.4%。(2)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的破坏效应依关系网络强度差异而表现出显著性差异。关系网络更为紧密的群体,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水平的破坏效应相对较小;反之,收入差距的破坏效应相对较大。

二、文献与假说

(一)收入差距与社会信任

收入差距与诸多社会问题发生联系,较高的收入差距不仅导致居民健康水平下降,而且对教育资源投入、社会流动、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1]-[3]}除此之外,收入差距扩大还引起了社会信任下降。^[4]

社会信任是指在正式的、诚实和合作行为的共同体内,基于共享规范的期望。一般意指普遍化信任,即个体对大多数人的信任。^[6]较高的社会信任水平有助于解决人与人合作过程中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有利于提高社会治理效率。^[7]并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8]不仅如此,较高的社会信任也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繁荣与稳定。^{[9]-[10]}

Rahn 使用 1975-1994 年的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收入的基尼系数与社会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11]Stephen 和 Zak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采用 1980 年前土地不平等代替收入差距,研究发现不平等程度扩大显著降低了社会信任水平。^[12]Alesina 和 La Ferrara 采用更为详细的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结果依然是收入差距越大,社会信任水平越低。^[13]辛自强和周正指出,中国社会信任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收入差距扩大是重要的影响因素。^[14]申广军和张川川从社会分层角度阐述了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的传导机制,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导致了社会地位分布两端增大,而高社会地位与低社会地位的人往往具有较低的信任程度,因此社会信任的平均水平呈下降趋势。^[4]

(二)关系网络的削弱效应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为生,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非常态”的乡土社会。这是典型的“熟人”社会,社会信任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即以自我为中心,越往外信任水平逐层递减。在这样的社会下,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是基于“地缘、血缘和业缘”的关系型治理结构,人与人之间形成的是关系型网络。“差序格局”和“地缘、血缘和业缘”的社会结构是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15]伴随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劳动力流动性日益增强,居民社会交往半径扩大,传统社会治理结构逐步瓦解。具体而言,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和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使得血缘和地缘纽带变得脆弱,人际关系的等级原则弱化,以人伦为本的人际关系受到契约化的人际

关系的冲击,功利性的人际关系逐步取代“人情关系”,即传统乡村社会中基于熟人互动所建立与维系的嵌入性关系正逐步向理性化、功利性的市场性关系过渡。^[16]

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治理结构,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一种基于陌生人关系的治理结构。在陌生的、匿名性质的社会交往中,货币、契约和法律使得每个人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缩影。建立在亲属、熟人或邻里之上的关系网络能够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进而维持封闭型群体的良好运行。^[17]这意味着那些关系网络强度高的“乡土社会”可能拥有更高的社会资本抵御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水平的不利冲击。相反,在关系网络相对疏松的“现代社会”,收入差距的恶化将对社会信任水平带来更大的不利影响。即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水平的不利影响实际是“关系依存”的。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水平的不利影响是“关系依存”的。关系网络越是紧密的群体,越能减缓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水平的不利冲击。

市场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差异,关系网络强度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差异。胡荣调查发现,城乡居民的社会资本构成差异十分显著,而背后的原因在于农村居民的团体参与度、亲属密友关系等方面相对于城镇居民更为频繁和紧密,即关系型网络在农村居民中更为紧密,而紧密的关系网络对提高居民信任水平有积极影响。^[18]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城镇化在带来工作机会和收入增加的同时,劳动力的流动意味着传统社会治理关系的退却。因此,相对于农村稳定的关系网络而言,城镇居民的流动性更强,关系网络更为薄弱,更加依赖于正式的、匿名的社会治理机制,收入差距扩大对城镇居民的不利影响相对更大。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推论:

推论: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收入差距扩大对城镇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不利影响更大。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所采用的主要数据来自中国家庭动态调查(CFPS),该调查覆盖全国25省162县635村14798户家庭,包括个体收入、信任水平、邻里关系、亲戚交往等详细数据。该调查分层、多阶段的抽样设计使其样本能够代表中国大约85%的人口^[19]。

(一)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为估计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text{Trust}_{pij} = \beta_0 + \beta_1 \times \text{Gini}_{pij} + \beta_3 \times X_{pij} + \varepsilon_{pij} \quad (1)$$

Trust_{pij} 表示第j社区i家庭p个体信任水平的二值变量,本文采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其中, Gini_{pij} 表示第j社区i家庭p个体所在县(区)的基尼系数,用以衡量收入差距, X_{pij} 包含一系列控制变量, ε_{pij} 表示随机误差项。

本文主要检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效应是“关系依存”的。因此,在基础模型(1)式上添加关系网络与收入差距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将式(1)扩展为实证模型式(2):

$$\text{Trust}_{pij} = \beta_0 + \beta_1 \times \text{Gini}_{pij} + \beta_2 \times \text{Network}_{pij} \times \text{Gini}_{pij} + \beta_3 \times X_{pij} + \varepsilon_{pij} \quad (2)$$

其中, Network_{pij} 表示第j社区i家庭p个体的关系网络。根据研究假说,本文预期 β_1 为负, β_2 为正。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信任水平将下降。关系网络越是紧密的群体,越能通过紧密的关系网络抵消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水平的不利冲击。

从社会信任水平的衡量指标看,文献主要选择居民对大多数人的信任来代表其社会信任水平。因此,本文依据 CFPS 调查中对“一般来说,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和人相处越小心越好?”这个问题的回答,来衡量社会信任水平,如果受访者选择“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则取值为 1,若选择“和人相处越小心越好”则取值为 0。

模型的关键解释变量为受访者所在县(区)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依据问卷中受访者年收入数据,计算出县级层面的基尼系数,用以刻画该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该变量在衡量收入差距方面已经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广泛使用^[20]。除此之外,本文使用泰尔指数作为基尼系数的补充指标。基尼系数与泰尔指数计算方法如下:

基尼系数:

$$G = 1 / (2 n^2 u) \sum_{i=1}^n \sum_{j=1}^n |Y_j - Y_i| \quad (3)$$

n 为样本容量, u 为收入平均值, $|Y_j - Y_i|$ 为任何一对收入样本差的绝对值。基尼系数越大,表示不平等的程度越大。因基尼系数对中等收入的变化非常敏感,而泰尔指数对高收入者的变化很敏感,与基尼系数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泰尔指数:

$$T = (1/n) \sum_{i=1}^n (y_i / (\Delta)) \ln (y_i / \Delta) \quad (4)$$

$$\Delta = (1/n) \sum_{i=1}^n y_i \quad (5)$$

n 为样本容量, y_i 为居民收入。泰尔指数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良好的可分解性质,即将样本分为多个群组时,可以分别衡量组内差距与组间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

对于居民关系网络衡量,现有文献通常选择邻里关系和睦程度、亲戚交往频率、单位时间段礼金支出作为衡量关系网络的指标。^[21] 邻里关系和睦程度越高,表明基于“地缘”所形成的关系网络越紧密;与亲戚交往越频繁,表明基于“血缘”所形成的关系网络越紧密。因此,本文根据受访者对“过去 12 个月,您家与邻里之间的关系如何”的回答来赋值,取值范围在 0-4,若受访者选择关系很紧张,则取值为 0,若选择很和睦,则取值为 4。同时本文亦选择“与亲戚交往频率”作为关系网络的补充指标。

本文还囊括了其他一系列可能影响信任水平的控制变量。在个人层面,教育能够显著的提高社会信任水平,因此本文将受访者学历加入控制变量里,以反映人力资本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效应^{[22]-[23]};个体的绝对收入水平会影响社会信任,因此本文将受访者的收入作为控制变量。^[4] 在家庭层面,家庭人口数量对社会信任有显著性影响^[24],本文将家庭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在社区层面,人口流动对社会信任产生影响^[25],本文将社区层面人口流动比例作为控制变量。同时为了尽可能地减少遗漏变量的影响,本文还选取了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收入、村人口数等。

(二)收入差距与社会信任

表 1 呈现了方程(1)基准模型及方程(2)扩展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第(1)列和第(2)列检验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具体而言,第(1)列是未添加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估计结果,关键解释变量“基尼系数”的估计系数为-0.663,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基尼系数每

增加 1 单位,平均而言社会信任水平降低 26.3%^①。第(2)列则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社会信任的因素,关键解释变量“基尼系数”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基尼系数每增加 1 单位,平均而言社会信任水平降低 27.4%。

表 1 基准估计结果

	因变量:社会信任				
	方程 1		方程 2		
	(1)	(2)	(3)	(4)	(5)
基尼系数	-0.663 ** (0.298)	-0.699 ** (0.283)	-2.260 *** (0.382)	-1.103 *** (0.314)	
基尼系数×邻里关系			0.490 *** (0.062)		
基尼系数×亲戚关系				0.153 *** (0.049)	
泰尔指数					-2.113 *** (0.438)
泰尔指数×邻里关系					0.350 *** (0.041)
个人收入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年龄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性别		0.105 *** (0.016)	0.104 *** (0.015)	0.103 *** (0.015)	0.105 *** (0.015)
受教育年限		0.009 *** (0.001)	0.009 *** (0.001)	0.009 *** (0.001)	0.009 *** (0.001)
婚否		-0.131 *** (0.024)	-0.131 *** (0.024)	-0.131 *** (0.024)	-0.129 *** (0.024)
家庭规模		-0.019 (0.018)	-0.020 (0.018)	-0.019 (0.018)	-0.021 (0.018)
邻里关系		0.130 *** (0.015)	0.181 *** (0.056)	0.129 *** (0.015)	0.215 * (0.012)
亲戚关系		0.0203 * (0.011)	0.0201 * (0.012)	0.036 (0.037)	0.013 (0.011)
家庭人均收入		-0.049 (0.067)	-0.051 (0.068)	-0.041 (0.069)	-0.057 (0.067)
少数民族		-0.072 (0.051)	-0.070 (0.051)	-0.076 (0.054)	-0.071 (0.052)
矿区		-0.107 * (0.056)	-0.104 * (0.055)	-0.106 * (0.055)	-0.101 * (0.055)
村人口		0.001 (0.018)	0.001 (0.018)	-0.006 (0.018)	0.001 (0.018)
村人口流动比率		-0.036 (0.081)	-0.047 (0.082)	-0.032 (0.085)	-0.059 (0.082)
观测样本数	30,344	26,045	26,045	26,045	26,045
调整的 R ²	0.0010	0.0137	0.0128	0.0085	0.0134

注:括号里为聚类至县级层面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

为验证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水平的不利影响存在“关系依存性”。第(3)–(5)列增加了关系网络与收入差距的交互项。如果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则表明紧密的关系网络会削弱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的不利影响。第(3)列用邻里关系衡量关系网络,基尼系数与邻里关系的交互项系数

①Probit 模型估计系数没有具体的计量意义,此处计算样本观测值的平均边际效应,下同。

显著为正,邻里关系和睦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①,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将降低19.2%。第(4)列将基尼系数与亲戚关系交乘,估计再一次显著为正,亲戚交往频率每提高一个等级^②,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将降低6.1%。第(5)列则采用泰尔指数替换基尼系数对收入差距进行刻画。估计结果表明,邻里关系和睦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将降低13.7%。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冲击效应是“关系依存”的,关系网络越是紧密的群体越能减缓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水平的不利冲击。

(三)城乡二元结构下收入差距冲击效应的异质性研究

相对于农村居民稳定的关系网络而言,城镇居民的流动性更强、参与的商业性活动更多,社会运转更多地依赖于正式的、匿名的社会治理机制。这种关系对双方的利益责任和风险都有着较为清晰的界定。^[16]建立在亲属、熟人或邻里之上的关系网络则能够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进而维持封闭型群体的良好运行。^[17]这意味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城镇居民的社会信任不利影响更大。为检验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影响效应的城乡差异,首先,对城镇、农村进行分样本估计,检验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在城乡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其次,设定一个二值虚拟变量urban,城镇取值为1,农村取值为0,构造方程如(6)式所示。如果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社会信任的不利影响更大,则可以预期 β_1 、 β_2 将显著为负。

$$\text{Trust}_{pij} = \beta_0 + \beta_1 \times \text{Gini}_{pij} + \beta_2 \times \text{urban}_{pij} \times \text{Gini}_{pij} + \beta_3 \times X_{pij} + \varepsilon_{pij} \quad (6)$$

表2汇报了城乡二元结构下收入差距冲击效应异质性的实证结果。

表2 城乡二元结构下收入差距冲击效应的异质性

	农村样本 (1)	城镇样本 (2)	全样本 (3)	全样本 (4)
基尼系数	-0.587** (0.284)	-0.812** (0.382)	-0.797*** (0.290)	
泰尔指数				-1.052*** (0.386)
基尼系数×城乡			-0.168** (0.078)	
泰尔指数×城乡				-0.105* (0.04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样本数	14,732	11,313	26,045	26,045
调整的R ²	0.0157	0.0130	0.0139	0.0139

注:括号里为聚类至县级层面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首先,分样本来看,第(1)列是农村居民样本回归结果,第(2)列是城镇居民样本回归结果。农村居民样本中关键解释变量“基尼系数”的回归系数为-0.587,在5%水平上显著,而城镇居民样本回归系数为-0.812且在5%水平上显著,(1)(2)列结果清楚表明城镇居民中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的不利影响效应相对更大。表2第(3)列将基尼系数与城乡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放入回归方程中,以此捕捉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影响效应的城乡异质性。估计结果再一次显示,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0.168且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城镇收入

①邻里关系变量分为5个等级,提高一个等级即该变量增加一个单位,下同。

②亲戚关系变量分为4个等级,提高一个等级即该变量增加一个单位,下同。

差距对社会信任的不利影响相对更大,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推论。第(4)列则使用泰尔指数衡量收入差距,回归结果与(3)列一样。

四、稳健性检验

(一) 遗漏变量问题

结果表明,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冲击效应是“关系依存”的。关系网络越是紧密的群体,越能减缓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水平的不利冲击。理论上讲,在回归中仍可能存在某些无法观测的变量,从而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个人经历会影响信任程度,尤其是曾经经历过因贫富差距带来的不公正待遇或认为社会贫富差距问题非常严重的人。除此之外,收入差距扩大使得低收入者的信任水平下降效应最为严重,若政府的基本公共保障未能供应,则会加剧居民的社会不公平感,从而削弱社会信任水平^[25]。

表3汇报了估计结果,其中(1)(2)列将受访者是否经历贫富不公待遇加入回归方程中,(3)(4)列将受访者对贫富差距问题严重程度的评价加入回归方程中,(5)(6)列将受访者对社会保障问题严重程度的评价加入回归方程中。上述六个方程中收入差距与关系网络交互项对社会信任的边际效应均保持在-0.190左右,与不添加相应遗漏变量时无显著性差异。可见,考虑可能遗漏的变量之后,关系网络的削弱效应依然存在。

表3 考虑遗漏变量下关系网络的削弱作用

	(1)	(2)	(3)	(4)	(5)	(6)
基尼系数	-2.180*** (0.384)		-2.261*** (0.381)		-2.260*** (0.382)	
基尼系数×邻里关系	0.474*** (0.062)		0.491*** (0.062)		0.490*** (0.062)	
泰尔指数		-2.031*** (0.440)		-2.113*** (0.437)		-2.114*** (0.438)
泰尔指数×邻里关系		0.339*** (0.041)		0.351*** (0.041)		0.350*** (0.041)
看见贫富不公	-0.042 (0.026)	-0.040 (0.026)				
经历贫富不公	-0.258*** (0.031)	-0.257*** (0.031)				
贫富差距不严重			0.081*** (0.029)	0.079*** (0.029)		
贫富差距非常严重			0.030 (0.032)	0.028 (0.032)		
公共保障不严重					-0.002 (0.026)	-0.002 (0.026)
公共保障非常严重					-0.019 (0.027)	-0.020 (0.02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样本数	26,045	26,045	26,045	26,045	26,045	26,045
调整的 R ²	0.0158	0.0163	0.0132	0.0137	0.0128	0.0134

注:括号里为聚类至县级层面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二) 人口流动的直接证据检验

关系网络的变化与人口流动有关,人口流动会使得关系网络发生相应变化。^[26]城乡移民群体在不同迁移阶段的关系网络存在差异,在迁移初期关系网络主要保留在乡土社会,而在迁移发展期则与迁入地区的互动更加频繁。对于迁移的居民而言,其关系网络强度随迁移时间

先降低后提高。如果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社会信任水平具有破坏效应,且紧密的关系网络会使得这种破坏效应减弱。对于刚发生迁移的居民而言,由于旧的关系网络逐渐减弱,新的关系网络还未建立牢固,收入差距扩大对社会信任的不利影响会比未发生迁移的居民更大。

本文选择问卷中受访者对于“您最近哪年哪月发生居住地的迁移”的回答来筛选样本,如果受访者最近 2 年内发生迁移,则认为该居民相对于未发生迁移的居民关系网络相对较弱。

表 4 汇报了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和第(2)列为分样本回归,第(3)列和第(4)列进行稳健性测试。第(1)列选择那些最近 2 年未发生迁移的居民样本,关键解释变量“基尼系数”的估计系数为-0.680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第(2)列则选择那些最近 2 年发生迁移的居民样本进行回归,迁移情况下关键解释变量“基尼系数”的估计系数为-1.592,且在 10%水平上显著,估计效应显著大于未迁移居民的估计效应。即疏松的关系网络确实会恶化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水平的不利影响。第(3)列将基尼系数与是否迁移的交互项放入回归方程中。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第(4)列使用泰尔指数作为关系网络的补充指标,估计结果同样表明,相对于不迁移的群体,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的不利影响在迁移群体中更大。

表 4 人口流动的直接证据检验

	无迁移 (1)	迁移 (2)	全样本 (3)	全样本 (4)
基尼系数	-0.680*** (0.299)	-1.592* (0.821)	-0.764*** (0.296)	
泰尔指数				-1.069*** (0.410)
基尼系数×是否迁移			-0.111* (0.508)	
泰尔指数×是否迁移				-0.085* (0.04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样本数	24152	1248	25400	25400
调整的 R ²	0.0091	0.0273	0.0092	0.0092

注:括号里为聚类至县级层面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

(三)工具变量估计

尽管本文验证了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存在不利冲击,但该因果效应可能面临衡量误差所引起的估计偏误问题。例如,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来源于调查所得的个人收入,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可能存在高收入受访者低报、少报个人收入等问题,那么收入差距的测量误差将导致低估真实的因果效应。除此之外,如果存在某种因素既与收入差距相关,同时对社会信任产生显著影响,那么遗漏该因素使得关键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存在偏误。综上,本文使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对收入差距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因果效应进行再检验。

本文选取中国房价行情平台上 2014 年县级住宅商品房平均价格作为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①。就相关性而言,自住房分配改革后,房地产业迅猛发展,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通过财富

^①中国房价行情平台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领导和组织,以禧泰房地产大数据为基础,实时向社会发布全国各城市房价。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部分县(区)级的房价未提供,因此选择该县(区)的市级房价数据,共得到对应 CFPS 数据中 162 个县(区)级房价数据,其中 48 个县(区)级来源于市级数据。

分配效应对收入差距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就外生性而言,住房价格对社会信任可能存在负向影响,但是表面的负向影响其实主要源于房价影响收入差距,进而影响社会信任。基于上述分析,有理由认为住宅商品房价格满足外生性条件。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第(1)列与第(2)列对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进行验证,第(1)列发现房价与社会信任存在负相关性,但在第(2)列同时控制房价与收入差距等关键解释变量时,房价则不再显著,表明房价与社会信任并不存在直接联系。第(3)列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显示:基尼系数每增加 1 单位,平均而言社会信任水平降低 22.7%。

第(4)-(6)列则加入收入差距与关系网络的交互项,估计结果再一次表明,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紧密的关系网络会削弱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的不利冲击。

表 5 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效应:工具变量估计

	(1)	(2)	(3)	(4)	(5)	(6)
社会信任	外生性验证		二阶段估计结果			
基尼系数		-2.054*** (0.164)	-1.700*** (0.652)	-1.856*** (0.682)	-1.667*** (0.640)	
基尼系数×邻里关系		0.458*** (0.038)		0.200*** (0.045)		
基尼系数×亲戚关系					0.095*** (0.033)	
泰尔指数						-1.362*** (0.442)
泰尔指数×邻里关系						0.273*** (0.075)
房价	-0.037*** 0.013	-0.020 0.01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一阶段估计结果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	泰尔指数
房价			0.008*** (0.001)	0.008*** (0.001)	0.008*** (0.001)	0.019*** (0.001)
观测样本数			25,499	25,499	25,499	25,499
调整的 R ²			0.033	0.033	0.033	0.053

注:括号里为聚类至县级层面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性评述

就实证层面而言,本文使用 CFPS(2014)数据,实证检验了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以及关系网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估计结果表明,一方面,如传统研究所强调,收入差距扩大将导致社会信任水平的下降,基尼系数每增加 1 单位,平均而言社会信任水平下降 27.4%;另一方面,收入差距扩大对社会信任水平的不利影响是关系依存的,邻里关系和睦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平均而言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的不利影响将降低 19.2%。关系网络比较紧密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不利影响较小;而关系网络比较薄弱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水平的不利影响会被放大。考虑到测量误差以及遗漏变量所引起的估计偏误,本文分别通过控制可能的遗漏变量、依迁移时间不同的分样本估计以及使用住房价格作为收入差距的工具变量估计,估计结果均支持本文研究结论。

本研究的政策含义体现为,提高社会信任水平要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让更多的

人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考虑到城镇化的过程就是传统的基于关系的熟人社会向现代的陌生人社会的转型过程,是社会治理结构重构的过程,社会更需要重视“关系网络”的软环境建设。“关系网络”与社会信任是互补性关系,是社会资本共同的组成部分,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抵消收入差距扩大对社会信任水平的不利冲击。简言之,社会转型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既要关注收入差距的扩大,更要关注社会资本的积累。

参考文献:

- [1]周广肃,樊纲,申广军.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4,(07):12-21+51+187.
- [2]周兴,王芳.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流动、收入差距与社会福利[J].管理世界,2010,(05):65-74.
- [3]王少平,欧阳志刚.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度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效应[J].经济研究,2007,(10):44-55.
- [4]申广军,张川川.收入差距、社会分化与社会信任[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01):121-136.
- [5]Wilkinson R G, Pickett K E. The spirit level: Why more equal societies almost always do better? [M]. London: Allen Lane, 2009.
- [6]Charles W J.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J]. Orbis, 1996, 40(2):333.
- [7]Stephen K, Philip K.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112(4): 1251-1288.
- [8]Nunn N, Wantchekon L.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istrust in Africa[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1(7): 3221-3252.
- [9]丁从明,邵敏敏,梁甄桥.宗族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8,(02):95-108.
- [10]Guiso L, Sapienza P, Zingales L.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3): 526-556.
- [11]Rahn B W. Individual-level evidence fo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7, 41(3):999-1023.
- [12]Stephen K, Zak P J. Building trust:Public policy,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Supreme Court Economic Review, 2003,(10): 91-107.
- [13]Alesina A, La Ferrara E. Who trusts other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0, 85(2): 207-234.
- [14]辛自强,周正.大学生人际社会信任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12,(03):344-353
- [15]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J].社会学研究,2004,(05):48-57.
- [16]王永钦.市场互联性、关系型合约与经济转型[J].经济研究,2006,(06):79-91.
- [17]伍麟,万仞雪,曹婧甜.中国社会治理进程中的信任变迁[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7,(02):157-165.
- [18]胡荣.社会资本与城镇居民的政治参与[J].社会学研究,2008,(05):142-159+245.
- [19]Xie Y. The user's guide of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D]. Beijing: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Survey, Peking University, 2012.
- [20]邹红,李奥蕾,喻开志.消费不平等的度量、出生组分解和形成机制——兼与收入不平等比较[J]. 经济学(季刊),2013,(04):1231-1254.

- [21] 丁从明,周颖,梁甄桥.南稻北麦、协作与信任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8,(02):579-608.
- [22] 黄健,邓燕华.高等教育与社会信任:基于中英调查数据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2,(11):98-111+205-206.
- [23] 史宇鹏,李新荣.公共资源与社会信任:以义务教育为例[J].经济研究,2016,(05):86-100.
- [24] 刘伶俐,吴江龙.青年群体社会信任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20个省市的调查[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5,(05):120-125.
- [25] 李涛,黄纯纯,何兴强,等.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8,(01):137-152.
- [26] 张云武.社会流动与流动者的关系网络[J].社会,2009,(01):122-141+226-227.

(责任编辑:路春城)

Income Disparity and Social Trus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ransition

DING Congming^{1,2}, ZHANG Liang¹, WANG Cong¹

(1.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2.Center for Public Economy & Public Policy Research,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disparity and social trust in transitional China by using CFPS 2014 data set.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on one hand, increasing inequality significantly decreases the level of social trust among residents in China, one unit increase of Gini index leading to 27.4% decline of the level of trust on average. On the other han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inequality on social trust displays “relation-reliance”, the closer social networks are, the less negative effects are, and vice versa. Compared to rural areas, the increasing disparity has a more substantial impact on urban residents’ social trust.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level of trust among social members, reform of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should be intensified to narrow the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o focus on the soft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of “relation networks”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accumulation of social capital.

Key Words: Income disparity; Relation network; Social trust; Social capital

